

◀（上接 6 版）

版的原件。每张器影及铭文照片,都已经编定号码,排好顺序。照片上浮贴着透明油纸,所有编辑讯息标记,都以铅笔注记在油纸上。照片的背后还浮贴标签,标上缩图比例。这数千张照片,分装在几百个牛皮纸袋中(见图三),每一袋就是《综览》一个页面的资料,有时一袋中包含两三页的资料,袋上都有清楚的标示。顺序与印刷完成的《综览》一样。

这是《综览》书稿资料。在这书稿的背后又是如何呢?2004 年去京都大学访问,在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后栋书库里,看到了林先生的青铜器档案资料,这是编辑《综览》的基础资料,每件器物单独制作卡片(见图四),包含照片、尺寸、收藏地、流转等资料,有条不紊地放在档案柜中,整整齐齐。我这才明白,书稿的背后,其实是有着更广更博的基底。那一刻,真觉得好感动。后来去东京拜访松丸先生,松丸先生的资料柜就在东洋文化研究所,也是同样井井有条,整齐而丰富。东京和京都互相交流资料,做双重备份保存。

举个例子。在追寻戴家湾青铜器的下落时,找到一件青铜尊,是在神户由某私人收藏,但线索到此为止,没法再追下去。我们发现这件器《综览》已有登录,在林先生的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清晰的照片、拓片,还有比《综览》页面更丰富的资料,包括线图绘手稿、详细的尺寸和藏家,讯息十分完整。这件器直到 2015 年在香港保利拍卖,才正式向世人公开。此前,大概只有林先生有着这么详细完整的记录。现在看来,林先生的黑白摄影,比拍卖图录的彩照还要好。

我们欣赏鸭子轻盈游过水面,有时却忘了鸭子的双蹼在水面下,拼命用力划水。我深深感觉到,前辈学者正是怀着热情与专注,点点滴滴地积累,经年累月地坚持与努力,才能有这样丰硕杰出的成果。林先生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优美的示范。

读了王世民先生及松丸先生的序言,都非常感人。听说,林先生常到东京和松丸先生一起讨论青铜器,两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但是下午五点钟一到,立刻收工,笑嘻嘻地携手一起去喝酒。这样的交情,真让人羡慕。

曹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在日本,像白川静、林已奈夫、松丸道雄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佼佼者,他们的成果得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学者的重视。林已奈夫先生的巨著《殷周青铜器总览》,我是 1990 年代在松丸道雄先生的研究室看到的,当时用了几天的

时间好好看了一遍。回来后就复印了一套。这套书将当时中国出土的先秦铜器几乎都收入书中。在分册上,也能看出林已奈夫先生的想法,第一册末尾放到春秋早期,第三册是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这是林已奈夫先生看到在这时期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商代到春秋早期,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是范铸法,从春秋中期开始,出现失蜡法了;纹饰的做法,之前是压塑、堆塑,之后是印模法;此外,春秋中期出现的新工艺,还有嵌铸红铜技术、嵌铸宝石技术、错金银技术、鎏金、镂刻工艺等等。所以,在春秋早期划线是非常科学的。

这套书的翻译出版,将日本学者独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让更多的学者受益,毕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体还在中国。

马今洪(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我本人见到过一次林已奈夫先生是在 1992 年 8 月,上海博物馆在银河宾馆举办了“吴越地区青铜器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国内外学者有近 40 位,林已奈夫先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长江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的论文演讲。承蒙马承源先生的提携,我也写了一篇关于浙江安吉三官乡出土的青铜器的会议文章,林先生在演讲的论文中也谈到了这批青铜器,因此,我格外关注,后来在参加会议论文集编辑出版工作时,又仔细研读了这篇论文的中文稿,可谓受益匪浅。

我第一次看到《殷周青铜器综览》是 1980 年代后期,书是林已奈夫先生赠送给马承源先生的。当时看到这部皇皇巨著,第一个感觉是震撼。马先生把这部书放在我们青铜部办公室一段时间,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翻阅,直到馆里为青铜部购买了以后才拿回去。马先生主编的十六卷本《中国青铜器全集》最早的资料整理、收集,我们就是以《综览》为基础进行的。当时我们复印了器物图版,再按照时代和国别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增删器物,形成一个初步的目录,提供给编委会和各位分卷主编。

吕静(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在这个场合,寥述一个先秦秦汉史学习者对林先生无限敬仰之情。林已奈夫先生的大名,在复旦大学本科生学习的时候,已经在历史系各位古代史先生的口中频繁出现。

1990 年代中期,踏入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和文学部的汉

籍中心资料室以后,看到了林先生的皇皇巨著和精彩论文,诸如《中国古代の神巫》、《漢代の文物》、《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一二三)、《戦国時代出土文物の研究》、《漢代の神神》、《中国古玉の研究》、《石に刻まれた世界 画像石が語る古代中国の生活と思想》、《中国古代の生活史》、《中国文明の誕生》,等等,爱不释手,借阅和复印,带回宿舍细细拜读。我看到了一位日本的学术大家,对古代中国文化领域中广度、深度和细部的把握,钦佩崇拜,油然而生。

林先生是一位学术大人物,尤其精专于中国古代文物制度、信仰思想、图像造型、车马兵器、衣裳服饰、饮食娱乐的研究。特别是林先生在 1970 年代开始,就关注到“文革”前后中国蓬勃兴旺的考古事业,并通过大量的出土文物,对古代物质文化展开系统研究。他是筚路蓝缕、开拓物质文化研究新领域的丰碑性人物。

周亚(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林已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铜器综览》不仅是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一个信息海量的资料库,甚至是一本每个研究青铜器的人肯定都需要必备的工具书。可以说在当时这本书最全面地收集了各个海内外公私文博机构收藏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其中有不少是我们只闻其名未见其形的著名青铜器,更有不少是我们闻所未闻的青铜器。林已奈夫先生应该是吸取了当时中国商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他把所收集的青铜器按器形分类,每一类又以其发展的进程为序排列,比如商代、西周都分早中晚三期,其中商代晚期又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在每一期中,他又分为 A、B 两段,分别代表这一期的前段和后段,这些都和当时中国商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密切相关。可以说,他将每一类青铜器都排列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发展序列。特别是他尽可能地将有铭文的青铜器的铭文拓片或照片放在器形图片边上,在每件青铜器的“图版出所目录”中,提供了相关的考古报告或著录书目,有些没有发表的青铜器,则尽可能标注收藏单位,方便读者检索后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

林已奈夫先生对学术史的钻研、尊重和学术批评精神

董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从前在林已奈夫先

生这部书没有中译本的时候,中国学者大多是利用《综览》的图版,来做些器形纹饰的比较研究,实际并不知道图版的编排逻辑如何,对《综览》真正的成就了解很少。这次看了《综览(第一卷)》的中译本,颇感觉今是而昨非。打个比方来说,从 1984 年日文版出版,到 2017 年中译本出版,这 33 年间,虽然有不少中国学者《综览》在手,却有似“买椟还珠”。今天这个译本“信、达、雅”三者兼备,第一次读到这部旧著的观点,若刀刀“新发于硎”,并没有过时的感觉。

我读《综览》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多处都能感到林已奈夫先生对学术史的钻研、尊重和学术批评的精神。《综览》对学术史的概说,在第一编第二章“发现、搜集、研究史”,分作中国、日本、欧美三个部分。分专题的学术史,也见于各章、节之前。在《综览》中,不仅有学术史编年,更重要的是,在每一项论著之后,都紧跟着林先生详略不等的评论,贯穿了整个学术史。评论既不吝于肯定和赞美,也有相当多毫不留情的批评。

对于郭沫若的《大系》,他指出,“就影响力而言,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值得大书特书”。然后用了一页篇幅介绍《大系》的成绩与方法,最后说“此书对学界的贡献不可限量”。

讲到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编不一定要通读,但若要看关于自己所关心问题的以往研究状况、必须知道的事情,非常有用,可以信赖。”

讲到陈梦家对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陈氏是演示了青铜器研究应该做而过去没人做的新研究方法”。又指出,这与陈梦家系统整理铭文,二者“是互为表里的”。松丸道雄先生也指出了陈梦家研究具有系统性的特点。

李济先生最终将陶器和铜器类型学总结为一套用数字和字母表示的编号,林已奈夫指出“像李先生那样根据抽象的标准对古代器物作分类,对要把陶器、青铜器作为历史资料的人而言,不得不说毫无意义”。据我所知,这种想法和实践似乎不止李济先生一个人,还有一些。

他对于日本学者的批评,无论是前辈、老师,措辞都严厉得很。常会令中国学者看得暗暗吃惊。

例如他引用容庚的话,批评京都大学考古教研室的开创者滨田耕作的水平低下,他又说了以下一段话:“滨田先生由于怀疑甚至不相信铭文,无法提出器物年代判定的任何根

据。我们不得不认为,他不相信铭文完全是因为他的不用功。铭文也好,器物本身也好,赝品多的是。只要是学者,就靠自己的能力排除赝品而已。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但是接下来,林已奈夫也认真分析了滨田断代方法,提出他断代水平受限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不知铜器的出土情况、器形纹饰有延续性,在主观上滨田不信铭文,也不看中国学者的著作。在这些不足之处,才造成后来进步的起点。我觉得,这才是尊重学术史,也符合学术史逻辑的写法。

他捎带对他的老师梅原末治先生不重视铭文也提出批评:“不幸的是,上述滨田先生对金文不用功和不努力去理解的毛病,被他的学生忠实地继承。”他批评梅原的器物分类混乱,最终的评价是:“总的来说,梅原先生擅长的不是研究,而是搜集资料。”

对于前辈学者水野清一的研究,林已奈夫说:“水野先生对青铜器的文章停留在陈梦家的阶段,没有开拓什么新的境地。但和连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的意义也不能理解的他的师兄(指梅原末治)相比,可以算是很大的进步吧。”乍一看来,这个评价已经很不错了。但在后文详细评介水野清一的论文《殷周青铜器编年的各种问题》,又批评得非常猛烈,例如说他轻信传出安阳的器物都属于商代,对铜器的“观察相当粗疏”,“判断错误的地方很多。这种话只不过是看着青铜器图录作的自言自语罢了”。

对于樋口隆康的研究方法,他说“樋口先生是率先利用这种(科学发掘)资料的考古学者,可以说他的青铜器编年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唯一评价较高的。但在后文也指出了樋口隆康《西周铜器的研究》一文“没有从正面讨论西周青铜器的上限是怎样的器这个问题”。

在批评了上述研究方法之后,林已奈夫先生讲述自己研究纹饰方面曾经的设想,即结合铭文和图像、传世文献三者,以及如何从纹饰的研究转向铜器编年研究的历程。最终就是强调科学考古信息的重要性、综合研究的重要性。这种学术史梳理,实际是讲方法论的演进过程,也为他自己的研究在学术史上做出一个准确的定位。

谈到早期欧洲人的中国青铜器研究,林已奈夫谈到叶慈(Yetts)与喜龙仁(O.Siren)的不同,说喜龙仁的《中国早期艺术》(1929)“此书总让人觉得有点不